

论两晋南北朝小说的发展背景

聂雪娟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出现了志怪和志人小说的分类,其形成原因表现在很多方面,统治者和上层人物需要小说引导世人服从统治,士人心态发生变化,清谈之风的盛行,佛教传入、道教的发展也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创作元素。这些都为当时的小说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小说;清谈;佛教;道教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1-0016-03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很多。如皇甫谧《高士传》、崔豹《古今注》,王浮《神异记》、陆氏《异林》、张华《博物志》、郭颁《魏晋世语》、葛洪《神仙传》、干宝《搜神记》、孔约《志怪》、袁宏《名士传》、裴启《裴启语林》、王嘉《拾遗记》、郭澄之《郭子》、荀氏《灵鬼志》、戴祚《甄异传》、刘义庆《幽明录》《世说新语》《宣验记》、刘敬叔《异苑》、东阳无疑《齐谐记》、吴均《续齐谐记》、裴子野《类林》、任昉《述异记》、殷芸《殷芸小说》、宗懔《荆楚岁时记》、《录异传》、侯白《旌异记》等,这里面包含志怪和志人小说,其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表现在诸多方面。

一、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支持

在封建统治的国家里,统治阶级的某种政治言论对社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即使著者心里不愿意,但为了性命、家人、利益等,也会向统治者屈服,英勇不屈的人寥寥无几,文化势必会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一种工具,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单纯的学术研究是不可能的。统治阶级利用小说的教化作用来实现政治教化,这也是统治者默认、支持著者的原因,一切具有反动意向的言论会立刻被抹杀。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和上层人物都很重视小说。如《博物志》的作者张华官至司空,《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位列藩王,《搜神记》的作者干宝领修国史,他们都是达官贵人,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统治阶级对小说相当重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小说的内容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一时期的小说大多记录上层人物的逸闻琐事,宣扬因果报应、天道轮回思想,如:裴启的《语林》记载了汉魏以来很多著名人物的遗闻轶事,干宝的《搜神记》大多描绘神鬼故事。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小说著者往往接受统治者的命令编造小说。如《世说新语·文学》

载:

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常与诸人道江湘事,特作狡绘耳,彦伯遂以著书。”刘峻注曰:宏以夏侯太初、何乎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稽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皮子高、王安期、阮于里、卫叔宝、谢幼典为中朝名士。^{[1]106}这则材料说明,为了东晋的统治和谢氏家族的名誉,大臣谢安授意袁虎著成《名士传》,那么,对这些名士评价当然利于东晋的统治,而无关事实本身。正是这样的原因,统治者对不利于统治的小说作品就会横加干涉。如晋武帝命张介删改《博物志》。据王嘉《拾遗记》记载,张华搜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遗闻轶事,考证神怪和民间传说,编成《博物志》四百卷,奏请晋武帝审查。晋武帝认为《博物志》“记事采言,亦多浮妄”,有可能“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因此,下令“荃截浮疑”,于是《博物志》被删成十卷。晋武帝这样做,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惧怕小说不利于维护他的封建统治。这与后世的文字狱是何其相似。这也说明当时文化发展的土壤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文化为政治服务的味道显而易见。

二、清谈之风盛行

士人心态发生变化,清谈之风的盛行,魏晋名士尚清谈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追溯清谈的源头,实肇始于汉代的清议,“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2]45}陈先生认为政治因素是清谈兴起的重要因素。清谈可以看成是士人对朝廷的一种消极避世态度,亦可看成

收稿日期:2014-01-18

作者简介:聂雪娟(1987-),女,汉族,河南濮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

是显示才学,谋求政治上的显身扬名的一种手段,这从清谈的内容可以看出一二。

清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据唐翼明先生的研究,清谈的内容涉及“三玄”、名家学说、佛经佛理、哲学命题(如有无本无之辨、自然名教之辨、言意之辨、才性之辨、圣人无情无情之辨、君父先后之辨等),以及讨论其他经典、人物批评与品鉴、养生延年之可能性、声有无哀乐、鬼神有无等。^{[15]103-117}汉武帝时,儒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和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时至魏晋,由于战争频繁,人们的思想得到又一次的解放,各家思想杂糅,形成了一种新的的经学思想,玄学产生。魏晋玄学是以《周易》、老庄为学术基础,易学的“极深而研几”。^{[16]81}玄学成为其清谈的主要内容之一,佛教、养生、鬼神等亦在其中。从人到物、从物质到精神,谈论内容涉及之广、范围之大,为一般士人参与讨论提供了机会,也为其进入仕途提供了可能。“每个人略有才情的,便想做名士;一做名士,便旷弃世务,惟以狂行狂言为高。或腐心于片谈,或视一言为九鼎,或故为坦率之行动,以自示不同于流俗。”^{[15]102}清谈者并不在乎己方所持的观点,而是辩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才思,论“理”而不求“理”,体现魏晋人的名士风度。“因为只有做了名士,才有资格去参加清谈的。”^[16]

清谈内容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如,张华的《博物志》、崔豹的《古今注》记载异物、奇人、灵怪、殊俗、琐闻等事情;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在《幽明录》中战争、死亡、疾病、饥饿是书中重复的主题。任昉、萧绎《金楼子》卷三《说蕃》曰:“竟陵萧子良……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好文学,我高祖、王元长、谢元晖、张思光、何宪、任昉、孔广、江淹、虞炎、何偃、周顒之俦,皆当时之杰,号士林也。”^{[17]11-12}至南朝时,清谈已经加入了佛经佛法的内容。小说内容无不与清谈内容密切相关。

三、人物品评流行

人物品评之风盛行,也成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条件。汉朝的察举征召、举孝廉制,曹魏的九品中正制等都需要考察士人的德行。凡是被赞誉的人,都可以被朝廷征召,步入仕途。由于豪门世族把持朝廷的选举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因此,一个人声誉的成毁,往往只在片语之间,为进入仕途,世人多对

人物的言行举止进行品评,《世说新语·雅量》记载王作桓温的主簿,桓温想要提拔他,有一次出游,故意用马冲之,“左右皆富仆”,惟王不动,于是名价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在《名士传》、《语林》、《郭子》之后,《世说新语》成为专门记载文人名士言行的著作。

总之,两晋南北朝的人物品评和清谈之风成为士人入世和避世的一种方式,也为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发展契机。

四、道教、佛教的影响

宗教也对小说的创作影响很大。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的生产生活遭到极大破坏,生命危机意识很强烈,他们普遍地将自己的荣辱兴衰、生老病死都诉诸于鬼神,社会上普遍弥漫着一种“宗教鬼神崇拜”的气息。^{[18]18-27}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就会依据心中所想,创造许多的鬼神,诸如我们所了解的掌握风雨雷电的四个神,统领阴间诸神,审判人生前的行为并给与相应的惩罚的阎王等等,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扩展到之后的鬼神崇拜,民间传统信仰和各种宗教信仰形成了中国民间杂乱的鬼神信仰体系,自然神、人神、人鬼、社会神出现在人们的信仰之中。原始社会流传的神话故事被世人歌颂流传,《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共工撞天、精卫填海等故事为我们所知,甚至拍成影视作品。时至两晋,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更是依赖鬼神迷信,神仙方术,即把它当成摆脱黑暗现实的精神寄托,又成为当时反抗社会暴政的一种方式。这种故事在《搜神记》《搜神后记》中有很多,《搜神记》既有赞扬神仙、方士的幻术和异术。如隐身变形、驱鬼逐妖、左慈、于吉、管辂等人的方术。又记载神灵感应、怪物变化、精怪、妖魅之事。鬼神故事也成为了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素材。

汉魏时期,佛教已经传入中国,特别是两晋南北朝时,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庙,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唐代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道尽了佛教的兴盛。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末年有寺院三万所,僧尼二百万。《洛阳伽蓝记》等著作均有记载。北齐、北周时寺院竟达四万余所,僧尼达三百万。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为小说的创作带来新的内容和影响,随着佛教的兴盛,出现

了佛教徒“自神其教”的《冥祥记》等专门宣扬佛法的小说。有的佛经故事,直接成为我国志怪小说的素材,如《续齐谐记》中的《阳羨书生》、《宣验记》中的《鸚鵡灭火》等。这些小说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寄希望于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同时又有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决心。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中指出:“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因果之谈”正是佛教思想之一。鲁迅先生称:“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9]可见佛教对中国小说的嬗变产生了很大影响。

道教的发展也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元素。道教是中国土生的宗教,张道陵创教,道教以修炼丹道法术为途径,以实现得道成仙为目标。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统治者对道教采用恩威并行的方式,使得道教得到一次发展机会。阮籍、王弼、葛洪、郭璞、陶弘景等成为这一时期的道教杰出代表,尤其突出的是葛洪,他将道教神仙方

术和儒家纲常名教相结合,构建了一套长生成仙体系。正是由于他们信仰道教思想,其言行就不免带有道家味道。按照两晋神仙方术,需要服食草药、炼制金丹,才可成仙,张华《博物志》卷五中就可看出汉末聚集在曹魏门下的方士们的事迹,王真、封君达、甘始、鲁女生、华佗、东郭延年、左慈等都成为曹氏父子追求长生的方士。颍川陈元方、韩元长的修道成仙故事亦可见。葛洪的《神仙传》、《抱朴子》也大力宣传通过服食丹药人人皆可成仙,他不仅承认神仙的存在,而且认为神仙有等级制度。《拾遗记》卷十“洞庭山”条叙采药石人入洞庭神山故事,说明神仙仙境的神秘。仙凡相恋的故事也在这时的小说中存在,如《搜神记》中“董永”故事、《搜神后记》之“白水素女”故事。道教思想的影响,使小说的撰述更加鲜明。

总而言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创作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的动荡不安、品评和清谈之风的盛行、佛教和道教融入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等等为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提供了素材,成为两晋南北朝小说发展的重要原因。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刘义庆.世说新语[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 [2]陈寅恪.清谈误国载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安徽:黄山书社,1987.
- [3]唐翼明.魏晋清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 [4]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
- [5]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6]白化文.麈尾与魏晋名士清谈[J].文史知识,1982(7).
- [7]萧绎.金楼子[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 [8]朱大渭.六朝史论[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
- [9]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On Developmental Background of the Novels during the Period of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NIE Xue-juan

(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Abstract:“Tales of mystery and the supernatural” together with “tales of human” appeared in the period of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reasons for the appearing of these two kinds of novels are: the rulers and upper classes needed certain novels to guide the masses to bow to them; idle talking were in vogue among the scholars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besides, the introducing of Buddh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also provided new creative elements to the creation of the novels. All these mentioned abo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vels at that time.

Key words:novel; idle talk; Buddhism; Taoism

(责任编辑:周锦鹤)